



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

北京 50年届 钟喜甲 1

钟喜甲，巴中50年届毕业生。1930年11月生于印尼，原籍广东蕉岭，九三学社社员。

人物履历

印尼万隆荷兰工科大学肄业，天津大学毕业，荷兰德尔伏特大学访问学者。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高级工程师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、中国西南资源联合开发总公司副总工程师。曾兼任交通部在京单位侨联主席，现任北京巴中校友会副会长，邦加侨友会会长。主持参与我国港口建设的施工、设计和科研项目，大小工程数百个。完成了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果22项，其中有四项属重大发明创造。

主要论文

著作、总结等33篇，其中有英、荷文各一篇存入荷兰大学资料室。曾荣获天津人民政府颁发的天津劳动模范称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、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全国归国华侨先进模范代表，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天津市抗震救灾模范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“三十年热心归侨、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”荣誉证书等等，荣获



2010年11月,80岁生日照

勋章、奖状和荣誉证书共计18件。

1930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。像大多数人一样，孩提时的我一直把这个到处都是采矿场、椰子林、胡椒园的岛屿当作自己的家乡。

尽管我们钟家在印尼已经繁衍息了五代，但自我懂事之日起，祖父和父亲就不断地告诉我，我的祖国叫“唐山”。尽管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“唐山”与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热带海岛有什么不同，更不懂得“唐山”于我而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涵义，但是我依然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。然而，那时懵懂年幼的我不曾想到的是，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，我将为她哭，为她笑，

为她挥洒汗水，为她付出了我大半生的忠诚与信念。

我的祖籍是广东蕉岭县新铺镇，地处广东省东北部，大量的汉族客家民聚居于此，是著名的侨乡。蕉岭远离海岸，四面环山，看似封闭，却阻断不了这个地方与大海的不解之缘。

印度尼西亚由13700多个岛屿组成，其中有两个盛产锡矿的是邦加和勿里洞。从1710年开始邦加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锡矿产地。而勿里洞岛则到1823年才发现锡矿。由于巨港苏丹国的倒台，邦加曾于1812年落入英国人手里，1814年荷兰人以极高的代价，即用印度的科钦，换回对邦加的控制权。

荷兰殖民者费尽心思地榨取这里的锡矿资源。他们认为，印尼土著人不能吃苦，采锡矿必须靠中国劳工。中国劳工于是大批来到邦加。他们大部分是从粤、闽两省被骗来的。这就是移民史上常提到的“卖猪仔”。我的高祖就这样来到印尼邦加

岛，被驱赶到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矿山当苦力，受到残酷的剥削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，劳苦一辈子也赎不起自己的人身自由。

峥嵘岁月在巴中

日本投降后我们一家移居雅加达。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，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，我渴望接受中国的文化教育，开始进入八华中。后来才知道，八华中学当时是被国民党势力控制的一所学校，校内两派学生斗争很激烈，有时发展到相互斗殴的地步。

1947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，转学到联合中学，后改名为巴城中学（简称“巴中”；“巴城”是印尼华侨对雅加达的荷兰语旧名巴达维亚的简称）。这是一所进步学校，师资阵容强大，教学质量高。我从初三一直读到高三结束。我偏重理科，在巴中打下了较坚实的数理化基础，并接受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，参加学校的一系列的爱国活动与社会工作，奠定了要回祖国继续升学的理想。

在巴中，我遇到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——教语文的钟仕民老师。他对我影响很大，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进步思想和书籍，讲国内国共两党的情况，在我心中播下了向往红

色中国的种子，给我毕业后选择人生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，没有钟老师的教导，就没有我日后毅然回国的决心。我参加学生会工作，时时听钟老师的指导。后来我才知道钟老师是从国内来的，是个立场鲜明的爱国主义者。那时，巴中刚建校不久，没有教室，我刚入学时是在三所华侨小学借校舍上课，学生分上下午班上课，我们班下午上课。

我到巴中的第一年，就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，和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张瑞元一起工作。建校委员会在1948年发动“百盾募捐”活动筹款建校，学生会成员都积极带领同学们参加这项活动，到社会上进行百盾募捐。我带着童子军小队找大企业募捐，有的企业家一听说是给巴中建校捐款都非常慷慨，立即开出万盾支票。两年后，新校舍果然建起来了，我们搬到新校舍，坐在亮堂的新教室里上课，心情格外的好，我更加发奋学习了。教职员工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。

学生在课余还组织话剧团，经常排练思想进步的话剧演出。四年间，演出的话剧有：《父归》《法西斯细菌》《毕业前》《万世师表》《雷雨》《日出》等进步剧目。过去这些话剧都在华人聚居区演出，但是我认为这样演出影响不够广，便反复